

## 当焦虑困住英特尔创始人



□崔滨

在IT史上那个著名的时刻，格罗夫说：“那我们为什么不走出去，先把自己炒掉，然后去动手做存储器以外的业务？”

春意融融，海风轻拂，出现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的一众大佬，却在异口同声地诉苦“焦虑”：银行家马蔚华焦虑“互联网金融宝宝”，地产商潘石屹焦虑“房多多”，连技术大咖张亚勤也焦虑得一天不看手机都心虚。

就像新浪曹国伟自己说的，“怎么能不焦虑，行业迭代太快了。除了焦虑当下的竞争，更焦虑的是看不清未来会有怎么样的一种方式、技术手段和使用习惯把我们现在的东西颠覆了。”

撇开这一幕回到20年前，1985年的美国加州圣克拉拉。如今的电脑芯片巨头英特尔公司的两位创始人高登·摩尔和安迪·格罗夫，要比亚洲论坛上的这群患了“商界焦虑症”的，更加困坐愁城。

“白天，这里是一个压力锅。晚上，我梦见自己被一群野狗追赶。”回忆当年，安迪·格罗夫写道。略微将回望的目光放远，你就知道格罗夫此言不虚。

上世纪70年代，在电脑产业方兴未艾的时代，由于英特尔公司在存储芯片领域内的率先发力，使其在全球市场占有率近乎100%。

如今，每个电脑硬件爱好者耳熟能详的计算机硬件性能每18个月增强一倍，价格下降一半的“摩尔定律”，就出自高登·摩尔之手。英特尔当年的辉煌，由此可见一斑。

但站得越高摔得越狠，心里也就越焦虑。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公司突然异军突起，他们凭借后发优势，以超大的投入和惊人的高效，迅速地用低廉的价格吞噬存储芯片的市场份额。

到1985年，英特尔的存储器销量断崖式下跌，产品严重积压，资金周转近于失灵，公司危机深重。后有日本公司不断蚕食，前方商业计算机向个人电脑过渡的趋势未明。那时的格罗夫，焦虑两字已然远远无法概括他的抓狂了。

随后，就是IT史上那个著名的时刻。那一年秋天，格罗夫走进公司董事长兼CEO摩尔的办公室问：“如果此时有一位新总裁来掌管公司，你认为他会采取什么行动？”摩尔犹豫了一下，答道：“他会把我们炒掉，然后放弃存储器业务。”

格罗夫说：“那我们为什么不走出去，先把自己炒掉，然后去动手做存储器以外的业务。”

再以后的，就是我们熟知的那一段“灯，等灯等灯”的旋律后，“英特尔，微处理器”。在格罗夫和摩尔勇敢地断臂求生后，英特尔顺利地穿越了存储器劫难的死亡之谷，开启了另一段芯片处理器的光辉岁月。

事后，安迪·格罗夫感慨，“作为经理人，我们憎恶变化，尤其是这些改变将我们卷入其中的时候。因为那些变化就像阴云笼罩天空，你需要不停观察才能知道它到底会不会雷电骤雨，所以，你不得不怀着谨慎诚恐的心情，小心翼翼地处理一切事物。”

但越是这样，乌云之下焦虑的决策者们越需要直面压力，而且深入痛苦，去感受变化的方向。当后来的追随者们不断回味安迪·格罗夫当年走出门去的勇气时，他们或许忽略了格罗夫身体内的另一种特质，那就是勇气的来源还是在于实力。只有以雄厚的技术实力为依托，才有可能战胜我们经常说起的市场变化、竞争对手、大企业病等等。

哦，对了，这里讲的“走出去去”的故事，都来自安迪·格罗夫的自述《唯有偏执狂才能生存》，当你困在焦虑之中无法摆脱时，不妨试试让自己变得偏执与勇敢吧。

## 养老金改革的最大利好是“解放”了公务员



□李克新

一个25岁参加工作的人，只要养老金缴够年限就可以说走就走了，一大批原来呆在体制内的公务员可以放心跳槽了，这才是这次养老金改革的重大红利。公务员里不乏一批能人，他们能创新、能创业，这可能是这次养老金改革的“顶层设计”的初衷吧。

春节后，有招聘网站统计数据 displays，原来抱着铁饭碗的公务人员竟然成了这段时间跨界跳槽最活跃的人群，据说同比增加了三成。而这里还不包括那些更高端的定向跳槽的高级人才。这些高级人才的跳槽是悄无声息的，不会让你一个网站统计上的。

很多人将此次公务员离职潮归结为反腐与新常态。这种解读有道理，但不全面。正在酝酿实施的养老金改革，其实就是公务员“离职潮”的催化剂之一。

从公务员层面看，很多人把养老金并轨制改革看成了“动奶酪”工程，原本衣食无忧的高退休金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全社会统一退休金，没有了体制内的优势。

但有一点，很多人没有算好账。按照新的全民养老规定，一个人只要缴纳一定年限的养老金，超过了这个年限，到了退休年龄都可以领取养老金了。这就意味着，一个25岁参加工作的人，只要养老金缴够年限就可以没有太多顾虑了，其实，这才是这次养老金改革的重大红利，一大批原来呆在体制内的公务员，可以放心跳槽了。

公务员里不乏一批能人，他们能创新、能创业。这次养老金改革，恰恰能解放体制内的大批人才，从这个角度说，公务员“离职潮”是好事。

回顾上个世纪初美国赶超欧洲列强，成超级大国的过程，其实就是走了一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路子。1945年二战后的美国本土上，没有像样的高速公路和州际公路，也没有城市化建设，但美国人需要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好的生活方式，他们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让人、商品、思想更自由地流动。

这个时代，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共同创新时代。于是，高速公路有了，城市发展了，通信技术应用了，甚至更大众的电视也在那个年代诞生和普及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曾出现过一批公务人员离职潮，离开体制内投身创业。济南高新区里就有一大批那个年代离职创业的企业家，他们现在干得风生水起，多家企业已经上市。但那个年代更多的是“行政呼吁”、“行政促使”。此次养老金的“顶层设计”，恰恰证明了政府引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潮流。顺势而为，呆在体制内的能人们，是否该认真考虑一下自己的未来了？

什么也阻挡不了人们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更何况国家的“顶层设计”就在暗示和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呢！

## 总理考察工商总局后吴海终于喊出多年的“憋屈”

“看了你给总理的信，我泪水夺眶而出。”  
“海哥，看了给总理写的文章，我顶你。”  
……

这是4月1日，吴海给笔者发来的一个截屏，都是看过他的文章后，朋友圈里的企业家们给他的留言。还有人赞叹他的勇气，说他胆子大，“换了以前，你可能坐牢了”。

“他们希望此事能够成为推动营商环境改善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吴海说，他文章引发的共鸣超出了预料，现在这篇文章的转载阅读量应该有几百万了。

吴海是桔子水晶酒店集团的CEO，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北京东城区政协委员。3月23日，吴海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里发表了题为《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的长文。这篇文章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副题，是“致克强：对企业好才能真的对人民好”。

吴海在这篇文章里，讲述这些年来他做酒店时与地方执法部门打交道遭遇的各种潜规则，并提出了改善营商环境的五条建议。这篇文章经过自媒体、网络、报纸转载后，短短一周迅速发酵。

吴海和笔者谈起他写这篇文章的缘起。那天半夜，他浏览新闻，看到李克强总理去国家工商总局考察，在座谈会上谈到坚决防止弹性执法，选择性执法，提升执法公信力，共同营造便民利企的良好环境等内容时，他“突然有了有话要说的冲动”，于是有了这篇一气呵成的文章。文中五点建议每一条都直指当前营商环境的改善。这五点建议是根据他去年在政协会议上的一篇发言整理出来的。结果，这篇“写给克强总理的信”被迅速引爆了。

吴海大学毕业后做过出纳，干过机票预订，卖过计算机，2006年投身酒店业，如今已经在全国开了近百家分店，在南海跌打滚爬多年，对于当下各地的营商环境，他如鲠在喉，“我们是做开门生意的，得开着门战战兢兢地面对每个穿官衣的人。”吴海很是感慨。

显而易见，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引发如此强烈共鸣，“憋屈”、“战战兢兢”这样的字眼无疑戳到企业家们的痛点。

“其实，不光是中小企业，私营企业，国企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有的逢年过节也要送礼。”吴海说，国企有问题可以找政府，但对于很多中小企业来说，这些问题不是不能说，而是不敢说。吴海也坦言，把问题说出来，不是为了自己，因为自己的企业规模大了，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相对强一些，他更希望大家都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出点改变。

新一届政府厉行简政放权，各级政府也都在公布权力清单，这让吴海有了底气喊出自己的“憋屈”。这篇文章总理能否看到还不得而知，但吴海说，北京市东城区政府已经给了他积极回应，“他们和我说文写得好，讲的内容对国家是有好处的，让我不用担心，别害怕。”

## 高富帅的资本如今也要转型了

“现在包括风险投资、股权投资等资本想挣钱也很难，他们躺着挣钱的时代结束了。”近日，一位专做资产并购重组的人士向笔者感叹，如今的经济环境下，不仅做实体的赚钱难赚，连原本最不缺钱，就靠花钱来挣钱的资本们日子也不好过。

众所周知，PE、VC原本都是“土豪们”干的活，选好有成长潜力的企业标的，几轮钱砸下去，最后靠上市后高额溢价得以退出。正因为动辄可以获得十几倍收益率，全国一度掀起过全民PE潮。可如今，他们却不得不从头开始学如何挣钱。

“原因很简单，好项目永远是稀缺的，你想投，我想投，大家都想投。”上述人士说，虽然现在大众创业热潮汹涌，但真正有市场潜力、有稳定团队、有扎实作风的优质项目依然难寻。只要有实力的资本，都是广布耳目，凡是可能有优质创业项目的地方，比如高新区创业园、新三板、区域股交中心，对好项目的争夺异常激烈。可要知道，真正各方面都优异的公司本身也不缺钱，更关键的是有一堆资本跟在后面等着送钱，你凭什么保证企业一定会选你呢？

笔者此前去北京参加一场创业项目对接活动，在某些热点领域，如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教育，手握巨资等待花出去的投资机构甚至比前来路演的项目都多。可以说，与前几年项目找钱的状况相比，博弈的天平已经转换为过剩的钱找项目。如此背景下，原本轻松赚钱的资本不得不开始考虑“转方式、调结构”。

“未来活得好的资本，一定是善于帮标的企业做全产业链整合资源的。”该人士说，其实投资机构最不缺的是钱，而某种程度上说最没用的也是钱，这不是自说自话，而是新常态下必须以被投企业的需求为中心。原来那种只等临门一脚的优质订单越来越少，投资机构必须把目光投向一些原本看不上的项目。

“送钱只是一方面，还要根据标的企业所处的行业，有针对性地解决它目前发展阶段所需解决的问题。比如医疗领域，很多创业团队可能就是手握一项比较先进的技术，组织架构、市场开拓，生产制造都刚开始起步，这时投资机构就可以在自己的资源库为其寻找可以匹配对接的相关资源，比如寻找一家规模较大的医疗企业，两者开展技术合作，或者直接让后者参股。这样一来，投资机构就从原来单纯的资金提供商变成创业综合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当有实力的机构都这样转型了，可想而知其他中小机构肯定更难存活了，行业洗牌不可避免。”上述人士分析。

由此可见，无论你曾身处多么光鲜的行业，在当前大变革的新常态下，不转型不调整就难敌市场环境变化。中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5年，创业环境和创业生态的改善有赖各方利益主体的共振，投资机构的这种变革无疑对助推创业是有利的。



□温涛

那天半夜，他浏览新闻，看到李克强总理去国家工商总局考察，谈到要坚决防止弹性执法、选择性执法，共同营造便民利企的良好环境等内容时，他“突然有了有话要说的冲动”。



□马绍栋

要知道，真正各方面都优异的公司本身也不缺钱，更关键的是有一堆资本跟在后面等着送钱，你凭什么保证企业一定会选你呢？